

中國佛教史論集
宋代佛教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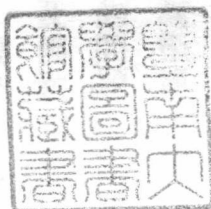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13748.0
2022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四十七冊

宋代佛教史研究
中國佛教史論集



中國書店

本册說明

本册包含「宋代佛教史研究」與「中國佛教史論集」兩部份。前者是有關宋代佛教的專著，後者則是發表在不同刊物上的中國佛教史論文的匯集，是「譯叢」編委會所編輯成書的。

宋代佛教是中國佛教史的轉型期。中外學者探討宋代佛教的單篇論文為數不少，但是成爲專書者，則不多見。高雄義堅博士這部書雖然篇幅不大，但是所論述的大多是宋代佛教頗爲重要而乏人探討的問題，像宋代的僧官與寺院住持制、天台宗與禪宗的抗衡、宋代禪宗的性格，以及佛教史書問題等等，都是相當重要而爲治史者所不宜忽略的。因此，該書印行後，很快就成爲宋代佛教史的代表專著之一，頗爲學術界所稱道。

「中國佛教史論集」包含七篇論文，其中保羅·戴密微是法國漢學家、冉雲華是加拿大的華僑學者，除了他們的兩篇論文之外，其他各篇都是日本學者的著述。七篇論文所敘述的主題並不一致，但是大體與中國佛教史有關。因此，我們將它命

名爲「中國佛教史論集」。初學者如果能仔細咀嚼各文的內容或撰寫方法，則對研究中國佛教的資訊，或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佛教的方法，當多少可以窺見端倪。

原書序

小笠原宣秀

本書著者高雄義堅先生於昭和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逝世於家鄉富山市。如今已經過了兩年半的歲月。但是先生慈祥的面容仍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腦海中，其咳嗽的聲音也彷彿仍在我們的耳邊響起，對先生我們有太深的懷念。

回顧高雄先生的學問生涯，大致可分為初、中、後三期。初期，明治四十二年春先生進入佛教大學（今龍谷大學）就讀，渡過七年的學校生活。尤其是進入考究科後，先後接受松島善讓、是山惠覺等兩勸學的真宗教學的薰陶。接著以寄讀生的身分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師事東洋史學的泰斗——內藤湖南、桑原隲藏兩博士，盡心研究中國佛教文化史。此時為先生學問上之轉捩點，由大正十年春開始執教於母校，成為龍谷大學東洋史學科的主導，異常活躍。接著，於昭和四年前往中國大陸勘察佛教史蹟；六年，率先研究金澤文庫所藏珍本書，更為中國佛教史的文獻研究增添一份光彩。其後直到昭和二十三年三月為止的二十四年間，先生盡力於龍谷的東洋史、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及教授之職，參學於其膝下

的學生更是年年增加。

然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的變動，以及先生身邊還有許多不得不處理的事情，遂辭去大學職務，回到家鄉。自此以富山市的蓮乘寺爲據點，併合以往教學的素養，盡力於鄉黨子弟的教學指導，同時也活躍於地方社會的教化活動。此時可視爲先生學問上的第三轉捩點。其所在地也因先生而提高文化水準，成爲北陸地區精神文化活動的燈塔，放出閃耀的光芒。

先生於龍谷大學在職期間，擔任本願寺派最高學階的勸學之職位，但昭和二十二年春又任勸學寮員的職位，故常常往返於富山、京都之間。先生一方面在中央教學界畫下自己的新地位，同時又與在京的衆多學者保持密切的關係，故對中國佛教史學的見識大爲擴展，而能窮究其蘊奧，此誠屬值得慶賀的事。其後，先生向大學提出久置於箱底的學位論文「中國近世佛教史之研究」，昭和三十年六月很順利地獲得文學博士的學位。其間，先生不斷地提攜吾輩，爲我母校佛教史學科振興，貢獻良多，令人不勝感謝。

其後期活動中，值得一提的是昭和四十三年以來，受命本願寺勸學寮之重職，在眞宗教學界內立於中樞的地位。這可以說是守護本願寺七百年來教學傳統的職務，先生直到逝

世之日爲止，都能善盡其職，功蹟不可謂不偉大。

先生學術著作中最主要的，有昭和十一年刊行的「三論玄義解說」；佛教史學方面，則有昭和二十七年刊行的「中國佛教史論」，一向得到學術界極高的評價。其不斷研究的成果，不久就形成學位論文的主要架構，先生爲了學位論文的發表著實費了許多心力。由於諸種事情，其概要及一部分的內容雖已發表，但先生還考慮作全體性的補訂，然後公刊於世。當我們接到先生的訃音，奔赴富山蓮乘寺時，聽到嗣子教磨氏述說先生書齋的書架上，還堆滿了本書的遺稿，以及許多參考資料、筆記、便條等，不禁慟哭。我等於其後，無論如何也要完成先生的遺志。然而時不我與，歲月荏苒，不幸於先生逝世一週年後又四個月，即昭和四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先生的未亡人律子也遽然去世。我等在痛失慈父慈母之餘，更加強了要早日公刊本書的決意。

這回，幸蒙百華苑主清水秀雄氏的深情厚意，本書的刊行才得以實現，實在不勝感激。在此，衷心地對清水氏表示謝意。並謝謝負責處理刊行等諸般事務的主要人物——小川貫次教授和中山正晃講師。我於雪深的山陰地區，追懷先生迫切期望本書出版的往事，現在於先生逝世後第三年，終於能見到其願望的達成，心中感到很欣慰。以上略述著者高雄

先生的業績，及本書成立的由來。首先，將新刊的本書奉呈在先生的靈前，衷心祈念此書對學術界有所貢獻，並產生極大的回響。

昭和五十年一月十六日

目次

一、宋代佛教史研究	高雄義堅著·陳季菁譯	一
原書序			一
序論			一
第一章 宋代的度僧制及度牒制			一三
第二章 宋代的僧官制度			三五
第三章 宋代寺院的住持制			五九
第四章 天台宗與禪宗的抗爭			七九
第五章 宋代禪宗的特性			九九
第六章 宋代社會與淨土教			一一三
第七章 宋室的南渡與佛教的復興			一二七

第八章	佛教史書的出現	一四七
第九章	日本的入宋僧俊昶和南宋佛教	一五七
第十章	宋代淨土教典籍和日本諸家的態度	一七七
後記		二〇九
作者簡歷		二一一
著作目錄		二一三
論文目錄		二一四
二、中國佛教史論集		
(一)	中國佛教的特徵	鎌田茂雄著·隆藏譯 二二一
(二)	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	橫超慧日講·隆藏記 二二九
(三)	維摩詰在中國	保羅·戴密微著·劉楚華譯 二四一
(四)	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給田	森慶來著·高福怡譯 二五三
(五)	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辯論考	冉雲華著·許洋主譯 二六五

(六)、初期的白蓮教會……………重松俊章著・陶希聖抄譯……………二七七

(七)、疑經研究……………牧田諦亮著・楊白衣譯……………二九七

序論

一

接續晚唐之後的五代，可謂是中國史上的一大轉捩期。其前的唐代，代表著集六朝以來之大成的中世紀完結篇，其後的宋代，則代表著面向將來，朝著新方向前進的近世時代的序章。宋代以後，隨著貴族階級的崩壞，擔當新文化的角色轉換成新興的讀書人階級，即所謂的士大夫，社會成爲大衆運動的時代。徹底說來，推動社會者不是國家，推動國家者却是社會，而推動其社會的力量移轉到大衆的手中，這是近世時代的特性。

與唐代爲止的文化——帶有貴族式特性——相對的，宋以後的文化轉變爲對應於一般人的普遍性。無論是在經學或文學，其對象、內容，還有其研究方法及表現形式等，都不含有什麼特殊的條件。繪畫方面，則脫離專家之手，產生出文人畫；書法方面則由於版刻的發達，各種法帖均開放給一般人。在這樣的環境下，獨有佛教依然故我是不可能的。佛教和其他文化現象相較，可算是最帶有尊重傳統的保守傾向，但隨著時代推移，在如上客





觀情勢之下，可以想見也作了某種程度的改變。

有關此點，我們就可以就中國佛教本身內部所發生的一些事情來考察。(一)來自印度西域的刺激斷絕(二)法難之後，緊接着五代的兵亂，諸宗的章疏典籍散佚殆盡(三)禪宗的發達。在以上諸事件下，乃促成佛教的一大轉換

首先就來自西方的刺激斷絕之事實來探究。佛教東傳中國以來，經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不斷有西方的梵本經典傳來，它們培養並育成了中國佛教。然而在元和五年(八一〇)般若三藏譯成「心地觀經」之後，唐代朝廷就中止了對譯經事業的護持。其後的中唐、晚唐，雖有尸羅達摩、牟尼室利、戒賢、菩提仙、滿月、智慧輪、法成、瞿多三藏、三昧蘇嚩羅、金俱吒等人前來，並多少作了些翻譯，但也只能算個人事業，較之般若三藏之前的譯作，質量上均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更談不上有足以補正、承繼以往佛教思想，或促進其發展的作品。

隋唐時代的佛教到中唐為止，三論、天台、三階教、淨土教、禪、法相、四分律、華嚴、密教等紛紛宣告成立，諸宗爲了增加教義思想的深度、期許哲理的更加透徹，當然是需要外來佛典的進一步刺激。反之，若欠缺外來的影響，自然就失去活力，教學思想也會陷

於沈滯不進，於是以哲理探求爲本位的向來的理論佛教就走進了死胡同，而不能不尋求其他的轉換途徑。

但在此必須考慮到的一問題，是有關於唐不空以後，經過了約兩百年，在北宋太宗、真宗期間，於傳法院所完成的國營翻譯事業。也許有人會質問這些大量的新譯經典，雖然着手較晚，但不是也提供中國佛教以新的刺激，並有助於挽回頹勢的作用嗎？茲檢討這些新譯作品的內容，太宗、真宗兩朝間譯出的經典有：

大乘經	一四五部	三四八卷
大乘律	一部	一卷
大乘論	一二部	二九卷
小乘經	四九部	七六卷
小乘律	六部	六卷
西方聖賢集傳	二一部	二九卷

以上，合起來共二三四部四八九卷。其中，施護、法賢等的翻譯中，將唐代不空、金剛智等未能全譯，或僅保存目錄的「金剛頂經」十八會中的某些部份補譯出來，可稱得上





是密教學者的一大福音。但是，宋以後的佛教徒對這些新譯經典所作的研究或注釋，僅有

聖無量壽經（法天、法進新譯七卷）疏 義學沙門知則撰（宋會要道釋卷二云云）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法天新譯五卷）疏 省才撰（大中祥符錄）

寶月童子問法經（施護新譯一卷）疏 楚南撰（大中祥符錄）

等三部，可以說宋代的新譯幾乎無法和唐代為止的翻譯經典並足而論。尤其是施護所譯「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一部卅卷，雖是「金剛頂經」十八會中初會的全譯本，有補足不空譯本之闕的重大貢獻，但其研究却未在宋土受到重視，反而在日本，由入宋僧成尋帶回的印經院摺本成爲日本東寺的重寶，並有「三十卷教王經文次第」一卷的新研究。

要言之，這是因爲新譯經典大部分是屬於密教部，其中摻雜了印度的墮落部分。加上密教特別重視傳燈相承，其相傳師資口訣較之經軌更受到尊重。宋譯的密部即使經典被翻譯了，修法觀法則限於是口訣而無法傳流，因此雖是有關生命的秘密行法，也落入毫無價值的結局。因此，縱觀當時的中國佛教，可以說宋代佛教已通過了外來佛教的包容期，進

入了要求中國獨特的佛教（異於喜歡冥想耽於觀念的印度民族，徹底適應立足在實用主義之上的中國民族的佛教）組織化的時代。

二

其次，就諸宗的章疏典籍散佚一事實來考察。中國自古號稱文字之國，文字在漢民族的文化中具有相當大的力量。因此，爲政者爲了整飭文字，制定「禁止刊行或發售」等政策的史例，從秦焚書以來卽層出不窮。從唐武宗會昌年間的佛教鎮壓，不難推測各宗學僧們的心血之作也和佛像、佛具一樣，遭到毀棄、破壞的命運。

日本慈覺大師圓仁的「入唐巡禮行記」卷四，會昌三年六月十一日之條下，有武宗將太子詹事章宗卿所撰「涅槃經疏」廿卷焚燒、又令中書門下搜索焚毀其宅邸內所有的草稿等記事。又，會昌四年三月的條下，記載著長生殿內道場的經教被焚毀、佛像被破壞；衆僧被遣回各本寺。道場內改爲安置天尊老君像、設道士，唸道經和修練道術。

此外，由五台山華嚴寺志遠的門下元堪，在武宗破佛之際，將章疏文句藏匿在屋壁等事。也可窺知佛典，特別是中國佛教學者的章疏類著作受到相當破壞的情形（參考宋高僧





傳卷七志遠傳)。而在此之前，由於玄宗天寶年間的安祿山之亂，和肅宗時代的史思明之亂，節度使強暴、宦官專橫，中央威令不行，再加上晚唐到五代期間戰亂頻仍，社會民心無一刻可稍作喘息，好學心也就相對減少，在這種情勢下，經學文學類的書雖然散佚不少，佛教典籍的損失也相當的多。

茲以天台宗的書籍為例。「宋高僧傳」卷七義寂傳裏記載，義寂因感慨智者大師的著作，遠受安史之亂、近遭會昌法難所焚毀，因而首先搜尋金華的古藏，但僅得淨名一書；接著乃與吳越的忠懿王商量，派人到日本找尋教典。「佛祖統紀」卷八法智本紀的論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當是時爲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暨我宋龍興。此道尙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由此可想見一斑。

於是乎，宋朝興起後，圖謀一般文化的再興。例如今民間的藏書家獻納書籍，授予獻納者地位作爲獎勵。在這樣的時運中，佛教典籍的蒐集工作也以吳越王族爲中心盛行起來，雖然是斷斷續續的，也曾發起到海外尋求聖典的活動。只是似乎談不上有什麼大的成果。